

◎ 张世林 编

為學術的一生

任繼愈題



為學術的一生

20 世 纪 中 国 学 人 自 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為學術的一生

◎ 張世林 編

—— 任繼愈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学术的一生/张世林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

ISBN 7 - 5633 - 5204 - X

I. 为… II. 张… III. ①思想家 - 列传 - 中国 - 20 世纪②社会科学 - 文集 IV. ①K825.1②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50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80mm 1/32

印张:18.75 字数:545 千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6 000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学林春秋》(初编),自1999年面世后颇获读者好评。该书面世时,书中的作者就有多位谢世,他们是:顾廷龙、陆宗达、傅振伦、邓广铭、单士元、杨伯峻、胡厚宣、周祖谟等八位先生。随着时光的流逝,又有一批作者相继辞世:金景芳、钟敬文、钱仲联、白寿彝、张岱年、杨明照、周振甫、史念海、周一良、罗继祖、马学良、程千帆、杨志玖、邢公畹、顾学颉等十五位先生,共计二十三位,超过全书四十四位作者的一半。因此,该书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不断有作者和读者托我购书,惜该书早已售罄,我又离开了原出版社,一直想重新联系出版事宜。恰在此时,碰上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人,想到该社近年来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在出版界和学术界口碑甚好,便同他们谈了这一想法。不想,一拍即合,很快便决定出版。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建议将书名改为“为学术的一生”。我认为书名和内容亦很贴切,遂同意并请任继愈先生题写了书名。但原书中仍有多处提到《学林春秋》,因为已是历史,便不改动了。同时,原书上的《卷首语》,真实地记述了我组编该书的全部想法和全过程,对读者了解是书会有帮助,除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外,应予保留。

总之,这部书就要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每想到书中的那些大师们,特别是那些已逝的泰斗们,他们给我的帮助和教益我当永志于心。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当永远记载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并将长久流传下去,泽被后世,嘉惠

学人。我坚信：随着时光的推移，是书的学术价值将会越来越被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看重。因为，这一批大师和他们的治学经验都是不可再得的！

张世林

2005年1月2日

卷首语

自1997年10月,我开始思考并动手组编这部书。我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书呢?说来话就长了。记得在1986年《书品》创刊号上发表了杨伯峻先生撰写的《我和〈左传〉》,颇引起了一些反响。许多读者来信谈到自己的读后感,认为杨文扼要地概括了自己几十年来研治《左传》的经历、经验和甘苦,实则是一篇个人治学经验的小结,读来生动、亲切,如同和作者对面交谈,对广大后学探寻治学门径颇有启迪。我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些反映,认为应该主动约请一些著名的老专家撰写回顾和总结治学经验的文章,不定期地在刊物上发表,以供广大青年学子学习和借鉴。我把这一想法向领导讲了,得到了领导的鼓励和支持。经过一段颇费周折的组织后,又陆续刊发了陆宗达先生的《我与〈说文〉》、周祖谟先生的《我和〈广韵〉》、王钟翰先生的《我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等文。这些文章均得到读者一致的好评。作为《书品》的责任编辑,我当时很想多组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但却因“以评介本版书为主”的办刊宗旨的限制,一时找不到那么多合适的选题和合适的作者。其后,也就是在1992年的年底,我因工作的需要,离开了《书品》,调入古籍小组办公室,参与创办新的杂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由于刊物的性质不同,再加上工作颇忙,一时便顾不上思考这个选题了。但是,在我调离之前,我曾当面约请胡厚宣先生撰写《我和甲骨文》一文,胡先生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一口答应了下来。可文章多是催出来的,由于我工作变动了,而胡先生又忙,这篇文章实际

上没了下文。一直到了1994年,有一天我去拜访胡先生,谈到了这件事,先生说已写了三分之一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先生告我:已写了一半了。我当时认为,胡先生身体一向很好,他总会写出来的。直到1995年先生生病住院前,还在电话中告我就差一个结尾了。我本想等先生出院后加上个结尾就行了,孰料先生竟因心脏病猝发而辞世了。后幸得先生的哲嗣振宇兄翻出并加整理誊清,才得以在《书品》上刊出。文章总算发表了,但此事却引起了我很大的震动。我想起了此前去世的俞平伯先生、缪钺先生、吴组缃先生、容肇祖先生,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请他们写一篇学术回顾文章保存下来呢?我进而想到,现在确还有一批老先生在世,但他们毕竟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若不能及时地将他们的宝贵的治学经验抢救下来,将是中国学术界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想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我感到我有责任、有义务尽快地把这些老先生们用一生积累下来的宝贵的治学经验总结并承传下去。但具体应该怎样做呢?我首先想到应该开列一个撰者名单,接下来便是根据每个人的研究领域确定题目。其后便是文章体例和内容方面的要求,这里面我考虑虽然是以回顾治学经验、体会和甘苦为主,但为了让读者对这些作者本身能有所了解,还应强调写一点个人简历和师承情况,以便读者能对学术传承和影响有一基本了解。有了这些构想,我便着手做具体准备工作,既然是抢救资料,便先以80岁以上的著名学者为准,由于我平时工作中比较注意和这些老先生联系,没过多久,便列出了一个基本名单。名单中有许多是外地包括香港在内的著名学者。但我一个人毕竟联系得有限,于是我便拿着这张名单向有关熟人和老师征询意见,如先后征询(有的还不止一次)过谢方、徐苹芳、金开诚、俞筱尧、裘锡圭等先生的意见,他们对我的这一计划均极表赞成,并替我添补了一些不应遗漏的人员和文章的题目。有了这个名单,我便可以“按图索骥”,开始联系了。当然,这项工作只能算是我的副业,须在完成主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双月刊的编辑工作之后进行。我把名单上的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北京地区的作者,一类是外地的作者。北京地区的作者我多半采取登门约稿的办法,可以当面把我的想法和要求向他们汇报,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约稿。于是我分别走访了邓广铭、周一良、季羨林、张岱年、阴法

鲁、王永兴、侯仁之、林庚、钟敬文、何兹全、张政烺、王毓铨、杨向奎、王钟翰、马学良、任继愈、瞿同祖、吴宗济、周有光、顾廷龙、单士元、傅振伦、刘起釞、周振甫、宿白、王利器、王世襄等先生。白寿彝、启功、冀叔英等先生，我则是采取去信征询意见、约稿的办法。当我把这一想法第一个告诉邓广铭先生后，先生很高兴地说：“你的这一想法太好了。对这些老人是要抓紧抢救才行，否则就来不及了。给我出的题目是什么呀？”“当然是‘我和宋史’啊！”“这个题目很好！很适合我，我一定写。”其时，先生手里的事情很多，却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令我很感动。其后，没几天，先生便住院了。当我得知先生的病情虽很严重，但头脑较清楚时，便同先生的女儿邓小南联系，希望在她陪住时，由先生口述，她负责记录整理。但先生不愿意这样做，他说医院的环境不适合写文章，“我要早些出院，回家后给张世林写那篇文章”。因为先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孰料，到了1998年1月10日，先生竟与世长辞了。我不仅再也见不到先生了，而且，先生一生积累于胸的研治宋史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和甘苦亦不能由他亲笔记述下来传给后人了。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每一念及，辄倍感痛惜。后在1999年2月份，到北大参加纪念邓广铭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会上邓先生长女邓可因在发言中提到：90年代初，父亲不知为什么，把我叫到身边，说要口述一篇自述文章，由我记录整理。待文章整理好后，送给父亲修改过目，但他改定好后，一直没让发表。前些天整理父亲的遗物，从箱子底下翻出了这篇文章。言者无意，闻者有心。待大会一散，我赶忙找到邓可因先生，说我很想要来这篇文章看看。过了几天，便收到了她寄给我的文章，打开一看，真让我喜出望外，题目为“我和辛稼轩的因缘是怎样结成的”，正与我的要求暗合，内容刚好讲述了研究辛稼轩的始末及心得体会，完全符合《学林春秋》的编辑要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总算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单士元先生是1998年5月去世的，在他生前曾把我约他写的《我和故宫》一文基本写出，只差一个结尾时，先生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现在的这篇文章是由他的女儿帮他结尾后交给我的，这是先生生前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这一集中最晚收入的一篇文章，总算抢救下了这一篇。王利器先生曾答应撰写《我和古籍整理》，但前一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太好，眼看发稿的时间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便打电话催稿，先生告我可

能要等一个多月后才能写出。无奈之余,我本想先发稿,等先生稿来时再相机处理。哪知,先生竟也遽归道山了。侯仁之先生、林庚先生、阴法鲁先生、王毓铨先生、启功先生俱因健康原因而未果。周一良先生本来很想写《我和魏晋南北朝史》这一篇,后因骨折而不得不放弃了,但先生还是就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各写了一首小诗加以概括总结。听说先生出院后,我便隔三差五地要么打电话问候,要么跑到他家中当面请安,但心里总惦着那篇《我和魏晋南北朝史》。其实先生早已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他一直在考虑着这篇文章,待身体好转些后,便请人将其记录整理出来。直到我真的拿到了先生的这篇大作,一颗悬了那么久的心才总算落了地,心里还真有些激动。因为这不仅可以减去我心中的一些遗憾,更会使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少一些遗憾。这才是我作为一个编辑所要追求的!

外地的作者我则一律采用函约的方式,幸得多数先生的厚爱和支持。唯詹锼先生因健康原因而未能撰写《我和李白》一文。

稿子虽然都约好了,作者也都答应写了,但要想把这一篇篇文章都收上来,确也殊非易事。因为这些先生们手头要写的东西很多,再加上他们年事已高,有的已写不了那么快,有的是自己已动不了笔,还有的是文章还没开头,人却住进了医院。总之,不催是不行的。干了这么多年的编辑工作,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文章都是催来的。好像谁催得紧,作者就先给谁写。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都要写好几封信,打好多个电话。除了几句客套话,便落到了正题:催要文章。因为我是在做“抢救”工作,不催不行啊!饶宗颐先生远在香港,我接连去了两封信,未见先生回音,于是又写了第三封信,总算接到了先生答应撰稿的回信。赵俪生先生最支持我的想法,表示一定要认真总结自己这几十年来治学心得,可真要动笔写了,却因白内障而不得不住院做手术。为此,他写信给我说,恐怕这次他实在不能写了。接到信后,我给先生回信表示安慰,并说眼睛若术后恢复得好,看得见东西时再写不迟,这部集子一定要等先生的这篇文章。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接到了先生寄来的稿子,在信中,先生说,术后眼睛还未能彻底养好,怕耽误了你的事,先把文章赶了出来。只是因为眼睛看东西总是有双影,故字写得不太清楚。拿着先生的稿子,我心里很激动,也很不是滋味,我是不是把先生催得太紧了?要说写信和

打电话给谁最多,是史念海先生。据说史先生答应要写的东西很多,我也是接连去了好几封信,先生才总算答应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的。最初,先生总是说没有什么好总结的。然而过了好一段时间,我已经收到了许多位先生的来稿,却还没有先生方面的音讯,忙打电话给先生,告我已开始动笔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忽接到先生的一篇来稿,打开一看,题目是“《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原来是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发表的(已发于该刊1998年第3期),是先生主动投来的。我赶紧又打电话去催,先生告我已写了一半了。之后,我怕先生又主动去给什么人投稿,隔上一段时间,便或去信或去电话,最后,总算把先生的这篇文章给催来了。当然,有时候光催也还是不行的,还要想办法。最初去拜访张政烺先生,约其撰文,因先生博学,到底写哪方面呢?最后和师母商定写《我和古文字》,先生听人说:“好吧!我写。”但那一段,先生的身体已明显不好,常常是拿着一本书,一坐半天,一页也没动。和他聊天,也是刚说完的就忘了,倒是几十年前的事还记得。其后不久,先生就住院了,手根本就拿不住笔了。怎么办?我又和师母商量,鉴于先生对老事记得较清,可否请先生的几个学生帮助回忆凑一凑,拉出个初稿,念给先生听,请他补充、订正。师母同意了这一办法,并和张先生的学生一道,帮助他把这篇文章整理了出来。

就这样,文章总算一篇一篇地被“抢救”出来了,既然如此,就要争取尽快出版。一来可以使广大的后学,特别是青年学子能够学习和借鉴这些学术界老前辈们宝贵的治学经验,从而少走弯路,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二来争取让这些老先生们亲眼看到凝聚着他们一生治学经验的结晶早些问世。为此,我是每接到一篇来稿,便马上进行审读和编辑加工。同时,商得中华书局领导同意,随时把加工过的来稿先行交我局照排室排版。所以,那个时期,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看来稿和校样到很晚。

正文都收齐后(包括原先在《书品》上发表的那几篇),我感觉还缺点什么。如何才能更形象、更传神地表达出这些大学者们的风采和学识呢?如何才能使广大的读者对这些老前辈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呢?为此,我决定在每篇文章之前,均加一张作者近期的生活照片,在照片下面放一张作者亲笔题写的治学格言,并在题词下面统一注明作者的生年(已故者只加照片并注明卒年)、

工作单位和职称。这样,我又紧急和作者或家属联系,经过一段紧张的劳作,总算把照片和题词都收齐了(有些照片是我到人家精心挑选的)。

接下来该排目录了,本想按类分成文、史、哲等,但有些文章内容比较丰富,往往兼有他类。为此,我请教傅璇琮先生,傅先生出主意说,可以直接按作者年龄大小排,以省却许多麻烦。我接受了傅先生的意见,于是大家看到的本书的目录就是依据作者年龄大小为序排列的(当然,这一下又少不了一番核对)。目录排出后,我又请许逸民先生过目,许先生提出读者光从目录上看不出作者在文中主要讲了些什么,可否在每篇篇名下附上由文中摘出来的最有代表性的几句话,以吸引读者。我按许先生的意见办了,当然,又要一篇篇地细读、思考、比较,然后摘录下来。

本书总算编好了,到底叫什么名字呢?谢方先生提议叫“学林春秋”,“春秋”即史。我编该书的主旨正是为了给中国20世纪学术史作一小结,故决定就用该名。遂征询顾廷龙先生的意见,并请其题签。蒙顾老厚爱,欣然题写,不胜感激。

在同白寿彝先生的联系过程中,幸得崔文印、曾貽芬二位的无私帮助,谨表谢忱。

在本书的排版过程中,得到了陈晓云等同志的密切配合,谨向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还要重申几句:本书是我个人所编,可能这个想法还不错,但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我虽然想把所有的学界的老前辈们的文章都尽可能地收集起来,可学识浅薄如我,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肯定还会漏掉一些人,只有请你们宥谅我了。当我腾出手来编续集时,一定会加以改正的。

哲人其萎,抢救当行!我想这不会是我个人的感触吧!

张世林

1998年7月31日

目 录

我和先秦史 3

金景芳 | 秦统一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我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属于亚细亚类型,不是古典古代类型。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界线是国家。因而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应为启杀益夺权,变传贤为传子,成立夏王朝,下限为秦统一。

我与中国民俗学 17

钟敬文 | 一般地说,民俗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研究民俗事象,也包括有关它的科学理论。而单就其理论体系来说,既有一般性质的理论,如理论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等,又有局部性的理论,如民具民俗学、工艺民俗学、语言民俗学、宗教民俗学和文艺民俗学等。

我和图书馆 43

顾廷龙 | 有人认为搞图书馆工作无甚学问。确实,图书馆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但对保存与传播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很有意义。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如今我对人生仍作如是观,并且努力在有生之年为图书馆事业多做点事情。

我与《说文》 55

陆宗达 | 处理好基础与专攻、广博与精深的关系,这对于我的学习与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几十年来,我总是离不开以《说文》作桥梁,通过运用《说文》,帮助自己解决古代文献语言中的疑难问题,解决《说文》与训诂研究的普及与应用的问题,解决发展汉语词义学的理论与方法诸问题。

我和中国思想史研究 61

蔡尚思 | 我是以研究中国思想史为主而不是以研究中国思想史为限的。如中国史学、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教育、中国经济、中国政治等皆兼注重之列。要求力所能及的博通,因为这几方面多与中国思想史有密切的关系。

我和文字改革

71

周有光 | 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变;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发生急剧变化……语文变化,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有意识的。有意识有计划的变化称为文字改革。

我和博物馆学研究

83

傅振伦 | 我建议成立“佚品博物馆”,征集国外所藏中国文物模型及书画摹品、照片,并设立户外史迹博物馆,扩建中国体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筹建地志博物馆……我赞成化私为公,将私藏文物捐献博物馆,因私人者似难持久也!

我和辛稼轩的因缘是怎样结成的

89

邓广铭 | 我在北大史学系读四年级时,文学学院院长胡适开了一门“传记文学习作”,我选修了这门课,并拟定要写一本陈亮的传记。当这本《陈亮传》写成之后,送交导师胡适先生去看。他写了很好的评语,加以称赞。同时也明确指出,对陈亮和辛稼轩的关系写得不够,应当大力加以补充。因此,考证辛稼轩的生平又成了我的一个课题。

我和故宫

97

单士元 | 从1924年底到今年,我从未离开故宫博物院,工作已七十四年。可谓一生问学无成,文博白了……余曾大胆妄为对女儿说,虽问学无成,但余在续故宫的历史……

我和清诗研究

103

钱仲联 | 清诗于八代、唐、宋以后,确能自创一新局面,学古而不是摹古,晚期还超越了学古而从事革新。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清诗适应此规律,在力挽明代复古狂澜的基础上,在继承前代遗产的实践上,在二百六十多年社会现实的土壤上,开出了独具清诗面目、超元越明、抗衡唐宋的新境界。

我和中国史学史

113

白寿彝 | 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而读书,要如畅游长江大河,务揽其优胜,要在“优胜”上多下工夫。江河一泻千里,历万水千山,如泛泛观望,不会有什么奇趣。如果在优胜之区多所盘桓,意境自会不同。中国史书繁富,必须选择重点书,多下工夫。在重点书中,还有重点的篇章。

我与语音学

129

吴宗济 | 我一生的经历,如汰繁就简来说,可说是一部“音路历程”的历史。最初是学业迁就了环境和兴趣,而不久就走上了兴趣决定了学业,更从而支配了环境的道路。这条路在有些亲友看来,是没有什么大“气候”的,而我则认为是有幸而选对了的。

我和中国哲学史

157

张岱年 |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我与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基本相同。在哲学理论方面,我与张申府的

观点基本相同。在哲学理论方面,我信持唯物论,推崇辩证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我努力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来进行研究。

我和《左传》 165

杨伯峻 | 从小不出家门,由我祖父亲自授读古书。读完《诗经》,便读《左传》,同时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后来插班进了小学三年级,仍然在放学后到祖父书房受读《左传》和《东莱博议》……

我和《文心雕龙》 171

杨明照 | 记得1931年春,我在重庆大学文预科听吴芳吉教授给班上开“文学概论”课,经常板书《文心雕龙》原文,绘声绘色地讲得娓娓动听。我中心悦而诚服,被那秀词丽句的骈文吸引住了。从此便与这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名著,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和社会史及法制史 185

瞿同祖 | 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极为突出的地位。

“我们”与中西古典学 193

林志纯 | 研究埃及学、亚述学、西方古典学、中世纪学以及波斯、印度、中国、阿拉伯、美洲的古典文明史和封建时代文明史,以加强对世界古典文明史的研究工作。

我和《诗词例话》 203

周振甫 | 看了《诗词例话》,好比在阅读诗词时,请诗词作家或欣赏家在旁一一指点一样,指点诗词好在哪里,提高我们的欣赏力,帮助我们学会欣赏诗词。它同光是阅读不同。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209

季羡林 | 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正确的。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给世界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产生了众多的弊端甚至灾害。第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15

何兹全 | 我与别人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主要有以下一些。一、盘庚以前的商和夏,还在氏族部落时期。盘庚以后的殷商和初年的西周,氏族部落仍是社会的基础组织。二、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变化是显著的。最显著的是城市的兴起,交换经济的兴起,真正意义的国家的出现。三、秦汉时代,是战国时代的继续。

我和甲骨文

229

胡厚宣 | 以往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较多用力于文字考释,偶有涉及史迹商讨者,所依材料又较零碎。我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如殷代的封建制度、婚姻家族宗法制度、农业、气候、方国、天神、图腾崇拜……

我与古文字学

243

张政烺 | 在古文字学方面,我积思最久、疑惑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六书”之说。上学时期我即留意考察。这也是我研究古文字一开始就不走传统小学遵奉《说文》之路,而在科学的古文字学日见兴起之时,直入以地下出土之各类古文字为研究对象之门的原因。

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

259

史念海 | 治理黄河就应该先治理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治理有了眉目,减少了侵蚀,泥沙就不至于随水流下,汇入到黄河,沉淀于河床之上。河床不再升高,就不必为修筑堤岸而多费心力……修补堤岸是治标,治理黄土高原是治本。从治本方面来说,这治理黄河和治理黄土高原,只能说是一宗事情,不应该强事分开。强事分开,于事并无补益,灾祸永难摒绝。

我和魏晋南北朝史

321

周一良 | 我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前后二十几年,对这段历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在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中,自信没有受到政治干扰,是没有违背陈(寅恪)先生的主张的。

我和中国上古史研究

329

王玉哲 | 我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民的身份问题》的论文中,再一次论证我所坚持的西周为初期封建社会的说法,对多年来社会流行的西周奴隶说提出异议。又发表了《西周金文中的“贮”和土地关系》,以期解决西周初期封建制下土地制度史上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我与元剧释词、白居易研究及其他

345

顾学颉 | 作为一个编辑,审阅、编写、出版一本书之后,对于这项学问,可以说已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和初步研究。这样工作多年,慢慢也就积累了不少“本钱”。但是,如果自己没有一个中心研究目标,泛滥而无所归宿,还是不行的。必须以本身研究的某门学问作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把需要的知识和资料积累起来、丰富起来,系统地加以融会、整理,便可为自己的研究项目所用。最后,总可做出些成绩来。这些都是我几十年的生活、工作和研究学问的实际情况。

我和文字训诂学

359

刘又辛 | 我在文字训诂方面有哪些“创新”的地方。第一,关于假借字的问题。第二,关于汉字发展三阶段的说法。第三,关于同源词的研究。第四,关于异体字的研究。

我和《辽史》 375

罗继祖 | 先祖父雪堂公(罗振玉)泛海归来,彼稷行迈,逮旅津之八年,爰于戊辰之岁筑室于辽宁省旅顺口将军山之麓,将习静温业兼课子孙。小子侍侧读书,初命辑《朱笥河年谱》,继以得辽代墓碑独多,且足订《辽史》之讹缺,乃命作《辽史校勘记》。

我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381

马学良 | 我从长期深入民族地区学习和调查研究民族语言的经历中,深感学习民族语言要经过严格的语音训练,学习民族语言不能单靠课堂学习,在校学习一段后应到民族地区实地学习,因为与当地群众相处,必须使用民族语言进行交际,因而比在校学话更易收效。

我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 397

王钟翰 | 记得1971年9月1日我被借调中华书局参加整理标点“二十四史”以外增加的《清史稿》一书的工作。同一天到书局报到的尚有启功同志,我们二人因事迟来了两个月。早两个月先到我们《清史稿》组的有罗尔纲、刘大年、孙毓棠三位同志。

我和校雠学 407

程千帆 | 我历来主张研究文学,要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文献学与文艺学密切地结合起来。文学批评应当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文艺学研究应当建立在文献学知识的基础上。从事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不一定人人成为文献学家,但应当人人懂得并会利用校雠学知识。

我与《髹饰录解说》 417

王世襄 | 当代考古发掘报告、文物鉴赏文章有关漆器的材料甚多……在那些年月里,我是多么想能外出采访,核实材料啊,可那是不可能的。拉上窗帘,围好灯罩,像做“贼”似的,闭门写作,还生怕被发现扣上“白专道路”帽子,开批判会。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我与唐史研究 427

王兴兴 | 我研究唐史,首先要感谢恩师陈寅恪先生。六十年中,我从先生受教,先生传道授业解惑使我读书为己,开始走上宋贤所开辟先生继承发展的为人治史之路。

我和汉藏语研究 449

邢公畹 | “汉藏语”是指汉语、藏语以及和它们可能有亲缘关系的许多语言的群体。“汉藏语研究”是语言科学的一种实际作业——对一系列有关的汉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语系。

我和《广韵》 461

周祖谟 | 我在进行校勘的时候,先以张氏泽存堂初印本作为底本,与其他宋本和元明两代的刻本对校,凡有不同,都记在泽存堂本的书眉上。这是一道工夫。然后另取一本泽存堂本与上述的二十种唐五代韵书对校,同样把不同处记在书眉上。这又是一道工夫。有了这两个校本作

基础,然后进行一字一行的校定……改正原书错字一千七百一十二字,增补脱文一百九十五字,删去衍文七十字,共校正讹误一千九百七十七处。

我和《马可·波罗游记》

467

杨志玖 | 1995年,英国学者伍德博士撰写出版的专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全盘否定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事实,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和国内外传媒的轰动。书中对笔者多年前写的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资料和阐述也予以否定。为此我写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一稿作为回答。

我与《中华大藏经》

481

任继愈 | 1982年,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成立大会上,我提出有必要编辑一套“佛教全书”《中华大藏经》。得到小组的批准并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我负责主持这一工作。我们即以《赵城金藏》为底本,与其他八种版本的大藏经对勘,终于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全部一百零六册。

我和中国神话

497

袁珂 | 我研究神话,是从1947年在台湾编审委员会做编审时候开始的,写了简本《中国古代神话》和神话论文《山海经里的诸神》。那是受了茅盾先生《中国神话研究ABC》的启发,觉得应该把散珠碎玉般的神话资料缀集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件比较完整的东西,普及到读者中去,以发扬曾经璀璨一时的我国古代神话的精神。

我和顾炎武研究

511

赵俪生 | 鄙人致力于顾炎武的研究垂六十年,下这番劳动,还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不是一个一般的爱国主义者,不是那种叫叫口号贴贴标语的爱国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抛头颅洒热血类型的爱国主义者,他是浑身浸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者。

我和敦煌学

521

饶宗颐 | 我一向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充资料,我的研究无暇对某一件资料作详细的描写比勘,因为已有许多目录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这是我的着眼点与人不同的地方。

我和《尚书》

529

刘起舒 | 我近几十年的精力都集中在《尚书》一书上,语其远,则是由于我早岁承祖父授读,进大学后受顾颉刚先生教导这两方面的深远影响;语其近,则是由于四十五岁时由上级调来协助顾颉刚先生完成他整理《尚书》的宏愿,就是秉承其整理《尚书》的意图与规划,担任考释译证《尚书》全书的任务。